

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四十四集 诗卷

臧克家 序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中国

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十四集

本书编辑委员会编

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, 1937—1949

In 20 volumes

VOLUME XIV: POETRY

Preface by Zang Ke-jia
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ress 1990

Shanghai, China

中国新文学大系

1937—1949

第十四集 诗卷

臧克家序

编辑： 本书编辑委员会

出版：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发行： (上海绍兴路74号)

经销： 新华书店

印刷： 上海大一数码技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0,625 插页 6 字数 748,000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0726-4/I·579

定价： 186.00元

(影印本2009年6月)

《中国新文学大系 1937—1949》编辑委员会

赵家璧(顾问) 丁景唐(顾问)

孙 颙 江曾培 余仁凯* 周 天

范政浩 郝铭鉴 聂文辉 倪墨炎

(按姓氏笔画为序,*为本卷执行编委)

本卷编选者

孙党伯

本卷责任编辑

林爱莲

封面设计

袁银昌

版式设计

蒋福海 王 敏

诗卷

臧克家序

序

臧克家

一九三七——一九四九，是伟大的十二年，也是充满了矛盾斗争、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二年！它，关系着民族的存亡，国运的盛衰，也对诗歌的动向与发展，起着导引与促进的重要作用。

这十二年，又分为截然不同的时期。前期，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、终于获得胜利的八年；后期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，国统区人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，争取和平，争取民主，争取解放的斗争浪潮汹涌澎湃的四年。

抗战前期，全国诗人，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，团结奋战，以笔作枪，精神乐观，斗志昂扬，诗情如潮，诗篇似海，街头诗、朗诵诗、抒情诗、叙事诗，……各呈异彩。

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由于诗人们所在地区不同，情况因之迥异。身在解放区的诗人，在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指引下，以欢腾的心情、高昂的斗志，写下了许多歌颂解放区人民为民族解放、为革命光辉前程而英勇奋斗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新的篇章。而在国统区的诗人们，鉴于抗战胜利前后，国民党实行法西斯专政，发动内战，倒行逆施，形势险恶，情绪由高昂而变为沉郁。他们的满腔悲愤，以讽刺诗为突破口喷薄而出，如闪电，如惊雷，如匕首，如迫击炮，一齐向着黑暗的黑心轰击！

不同的时期,不同的诗人们的情绪,就产生了情调不同的诗。

—

三十年代中期就以《大堰河》闻名于世的艾青,抗战时期获得了更大的成就。“七七事变”后,诗人满怀热情地寻求着光明,行踪遍及半个中国,扩大了视野,把握到时代的脉搏。抗战前期,他向祖国和人民奉献出了《北方》、《他死在第二次》、《向太阳》、《旷野》、《火把》等诗集和长诗。《北方》收入了诗人抗战初期的重要短诗,它记叙着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,表现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热情和信心;有时略带悲怆的诗句,正是作者感情深沉、热切的表露。作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的《向太阳》,是诗人的第一部长诗,它“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,赞美着民主”^①,反映出抗战初期的热烈气氛。诗集《他死在第二次》中的《吹号者》,“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,献给牺牲”^②。长诗形象地描绘了吹号者对号角的热爱和对黎明的向往。这首诗,犹如飞着“血丝”的号角那样悲壮和庄严,作者在凝练的诗句中灌注着自己深沉的爱。长诗《火把》,歌颂了“群众的行动所发挥出来的集体的力量,群众本身所赋有的民主的精神”^③。诗篇接触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克服个人主义情调,转向伟大的革命集体主义的重大问题。《火把》是诗人的丰满热情与美丽理想开出的艺术花朵。

“皖南事变”后,艾青奔赴延安,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,生活和创作进入到新的境界,洗刷了早期作品中的忧郁感。《黎明的通知》、《反法西斯》、《雪里钻》、《献给乡村的诗》等诗集,描绘了解放区的崭新生活,为工农兵而歌唱。诗人还站在雄伟的宝塔下,

①② 艾青:《为了胜利》。

③ 艾青:《关于〈火把〉》。

向“远方的沉浸在苦难里的城市和村庄”，发出了“黎明的通知”。

艾青的诗，较好地做到了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。“他擅长以散文式的诗句自由地抒写”；“他的诗歌富于丰满的形象与诗意”；“具有内在的旋律与整齐和谐的节奏”。“艾青的诗，标志着‘五四’以后自由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。”^①

田间，一九三八年就到了延安，他也是这时期很有影响的诗人，被闻一多誉为“时代的鼓手”。他的《给战斗者》、《她也要杀人》等诗集，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、宁死不屈的战斗意志和对于侵略者复仇的坚强决心。《给战斗者》是他的代表作。作者曾说这诗是一个“召唤”，“召唤祖国和我自己，伴着民族的号角，一同前进”^②。闻一多称赞田间的街头诗具有一种积极的“生活欲”，“鼓舞你爱，鼓动你恨，鼓励你活着，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，在这大地上”^③。街头诗《假使我们不去打仗》就是一首代表作。长诗《她也要杀人》^④，描写一位中国北方农村妇女的悲苦命运。诗中的“她”，就是中国人民的化身。诗人在被压迫的劳动人民身上，寄托着民族复兴的希望。这时期田间的诗，短促的、鼓点似的节奏，有力地配合了战斗的内容，一个个短行，犹如电光闪闪的战斗火花，给人以冲击和力量。

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田间创作的《抗战诗抄》、长诗《戎冠秀》、《赶车传》（第一部），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新的探索。《抗战诗抄》中的“小叙事诗”，诗句凝练，描绘的场景和形象，颇精彩动人。《赶车传》采用民歌表现手法，描写贫农石不烂翻身的故事，富有传奇色彩。

① 唐弢、严家炎主编：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（三）。

② 田间：《写在〈给战斗者〉末页》。

③ 闻一多：《时代的鼓手——读田间的诗》。

④ 后改名为《她的歌》，收在《给战斗者》集中。

田间是“新时代的擂鼓者，新世界的战斗者，新诗歌艺术的探索者”，“在我国新诗的发展上有着不可轻视的艺术革新(或曰创新)的特殊意义”^①。

诗坛老将郭沫若，抗战一开始，就“别妇抛雏”离日回国。他高吟着“四万万人齐蹈厉，同心同德一戎衣”，投入战斗，主要是从事文化领导工作。抗战初期，他创作的诗集《战声》，充分表现了他的抗日救亡热情。诗中所表达的昂扬斗志和热烈情绪，与《女神》一脉相通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反动腐朽的面目日益暴露，他的诗作也从歌颂、号召，转而为揭露、批判。收入《蝈螬集》的部分诗歌，抒写了这种情绪，如《罪恶的金字塔》、《进步赞》、《挽四八烈士歌》等篇。

老诗人柯仲平到延安较早。一九三八年创作的《边区自卫军》和《平汉路铁路工人破坏大队》(第一章)两首叙事长诗，歌颂了工农的英勇斗争，在表现形式上，吸收了民间歌谣的长处，是他的代表作。他写的短诗如《告同志》等，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。

何其芳，《汉园集》作者之一，一九三八年奔赴延安。行前，他写了《成都，让我把你摇醒》。这首诗，不仅呼唤昏睡的现实，也反映他自己的惊醒。到延安后，他“投身于神圣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，开始从艺术的‘象牙之塔’中走了出来。……他的思想与诗风都为之一变”^②。这时期他创作的《夜歌》、《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》、《生活是多么广阔》等诗，收在《夜歌》^③诗集里。这些诗，表现了他的“旧我”与“新我”的矛盾斗争，有的歌唱革命、青春和新的生活，也有的歌唱革命给自己带来的变化。

《汉园集》的另一作者卞之琳，一九三八——一九三九年留延安期间，曾去太行山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访问。此行，使他产生了新

① 贺敬之：《田间诗文集·前言》。

② 周扬：《何其芳文集·序》。

③ 重印时，更名为《夜歌和白天的歌》。

的创作——《慰劳信集》。诗集中的二十首诗，歌颂了抗日战士和群众，情绪乐观；艺术上也较以前朴素、平易。

“现代派”诗人戴望舒，经过抗战的洗礼，走出了“雨巷”。一九三九年，写了为祖国人民的自由解放而祝福的《元旦祝福》一诗。一九四一年香港沦陷，被日寇逮捕，在狱中写下了一些光辉的诗篇。有的表现了他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，如《狱中题壁》；有的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向往，如《我用残损的手掌》。艺术风格也随之变得明朗刚健、朴素自然。

老作家王统照，是以写小说闻名于世的，他也是诗人。一九三七——一九三八年，他创作了许多诗篇，集为《横吹集》、《江南曲》。其中《上海战歌》三首，格调悲壮，气势宏伟。《五月夜的星星》、《展一片绿野铺入青徐》等抒情诗，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深情。

二十年代就闻名于诗坛的冯至，在这时期也重执诗笔，写下了他的代表作《十四行集》，采用他所熟习的西方十四行诗形式，却“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诗体的传统格律”，“利用十四行结构上的特点保持语调的自然”^①。诗写得很圆熟，在移植外来诗体方面，取得了相当成功的尝试。

“湖畔”诗人冯雪峰，抗战前长期从事左翼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。一九四一年二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，他在监狱里坚持斗争，以比较曲折的表达方式，用诗抒写了一个革命者战斗的、不屈的灵魂。这些诗篇，集为《真实之歌》和《灵山歌》，给读者以鼓舞和力量。

光未然（张光年），以写歌词和朗诵诗闻名。抗战前夕，就发表了歌颂抗日志士、反对卖国投降的歌词《五月的鲜花》。一九三九年三月在延安创作了组诗《黄河大合唱》。这组气势磅礴、雄健浑厚的英雄诗篇，经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谱曲，相得益彰。“音节的雄壮而多变化，使原有富于情感的辞句，就像风暴中浪潮一样，震撼人的心

^① 冯至：《诗文自选琐记》。

魄。”^①一九四〇年他在重庆创作的长篇叙事诗《屈原》，亦有相当影响。

高兰，有“朗诵诗人”之称。抗战初期，出版有《高兰朗诵诗集》，其中《我们的祭礼》、《我的家在黑龙江》、《哭亡女苏菲》等诗篇，取得相当好的朗诵效果。《哭亡女苏菲》是他的名作，感情真挚、悲痛，感人至深。

力扬，在这时期出版了《我的竖琴》及长篇叙事诗《射虎者及其家族》。《射虎者及其家族》以悲愤的激情、朴素有力的诗句，谱写出了旧中国农村中射虎者一族的“悲歌”，及其子孙们“那永远的仇恨”。这种仇恨是属于整个被压迫阶级的。这首长诗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。

当时活跃在大后方的，还有原中国诗歌会的诗人和其他诗人，如王亚平、穆木天、蒲风、任钧、柳倩、臧云远、方殷、方敬、吕剑、徐迟等。其中王亚平出版了《红蔷薇》、《生活的谣曲》、《火雾》等五部诗集。他的《血的斗笠》、《塑像》等诗篇，表现了抗日战士的英勇，抒发了作者炽热的爱国激情。

由文学理论家、诗人胡风主编的、先后于一九三七、一九四五年创刊的《七月》、《希望》文学杂志及《七月诗丛》，拥有一批诗作者，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主要作者除艾青、田间外，还有鲁藜、绿原、邹荻帆、冀沅、亦门(SM、阿垅)、孙铤、天蓝、曾卓、庄涌、彭燕郊、牛汉、化铁、艾漠(贺敬之)等。他们当时有的去了延安，有的奔赴前线，有的留在后方。他们的作品从不同方面表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斗争，发扬了诗的现实主义传统，肯定和继承了自由诗体的形式，又注意“主客观的高度一致，包括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”^②。形成了一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

① 郭沫若：《序〈黄河大合唱〉》。

② 绿原：《〈白色花〉序》。

响的流派——“七月诗派”。他们的诗作，有些由胡风主编，选入《七月诗丛》，其中有胡风的《为祖国而歌》、亦门的《无弦琴》、冀沅的《跃动的夜》、庄涌的《突围令》、孙铤的《旗》等等。各人还出版有数量不等的诗集。

鲁藜的诗集有《醒来的时候》、《锻炼》、《星的歌》。他的诗，青春气息很浓。代表作《泥土》，颂扬了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；《红的雪花》，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。

绿原的诗集有《童话》、《又是一个起点》、《集合》等。《童话》中的诗，浪漫主义气息较重；后两部诗集里的作品，冷峻、坚毅，敢于直面人生。

邹荻帆出版有《木厂》、《青空与林》、《意志的赌徒》、《雪与村庄》、《跨过》和政治讽刺诗《恶梦备忘录》等多部诗集。

三十年代初期以《烙印》、《罪恶的黑手》等诗集引起诗坛瞩目的臧克家，抗战一开始，就引吭高歌，奔赴前方达五年之久。在戎马倥偬中，写下了《从军行》、《淮上吟》、《古树的花朵》等长短诗集六部。诗篇热烈地歌颂了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，充满了胜利的希望和信心。《伟大的交响》、《血的春天》、《兵车向前方开》等诗篇，洋溢着乐观情绪和战斗激情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，现实使他把笔锋转向他所熟悉的农村，创作了与《烙印》一脉相承的《泥土的歌》，其中《三代》、《春鸟》是代表作。在《春鸟》一诗中，作者通过诗人与春鸟的反差对比，揭露了黑暗现实，抒发了诗人向往自由、渴求真理的心情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诗人从前方到了山城重庆。抗战胜利前后，他看到国民党反动派不顾人民的死活，依仗美帝发动内战，便以愤怒的、火样的激情，把笔尖“刺向黑暗的‘黑心’”，写下了《胜利风》、《宝贝儿》、《枪筒子还在发烧》、《谢谢了“国大代表”们！》、《“警员”向老百姓说》、《生命的零度》等大量政治讽刺诗，收在《宝贝儿》、《生命的零度》两个集子里。他在《枪筒子还在发烧》一诗的最后两节中写道：“大破坏，还嫌破坏得不够彻底？/大离散，还嫌离散得不

够惨?/枪筒子还在发烧,/你们又接上了火!/和平、幸福、希望,/什么都完结,/人人不要它,它却来了——/内战!”臧克家的讽刺诗,大部分是对国民党的揭露、控诉、斥责。评论家张光年说:“这些诗表达了一个革命诗人的正气和大无畏精神,并且满怀信心地迎接‘一个奇怪的变’。”^①

由于臧克家深受古典诗歌的影响,在诗的风格上,早期作品严谨、含蓄、精练。这时期,诗人视野开阔了,诗风也变得奔放流畅;为了发挥政治讽刺诗的社会效益,诗的语言就更加朴素、自然了。

袁水拍,是解放战争时期很有影响的诗人。抗战前期,他出版了抒情诗集《人民》、《向日葵》、《冬天冬天》。其中《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》颇有名,诗人从对苏联人民的歌颂中,寄托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与期望。抗战后期开始,诗人面对黑暗现实,善于从政治上把市民阶层里某些司空见惯的社会生活现象,用漫画式的手法和讽刺语言予以鞭挞,寓讽刺于叙事之中;并汲取民歌、民谣、儿歌中的艺术经验,采用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五言、七言等诗歌形式,用马凡陀的笔名,写了大量政治讽刺诗,集成《马凡陀的山歌》及其“续集”,影响很大。其中《主人要辞职》、《一只猫》、《发票贴在印花上》、《这个世界倒了颠》等讽刺诗,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依靠美帝发动内战的丑恶面目,揭露得淋漓尽致。“马凡陀山歌不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现象的描绘上,而是透过现象努力挖掘它的本质,引导读者认清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源”^②,“激发了读者的不满、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”^③。在上海,我亲眼看到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的游行队伍高唱着《山歌》奋勇前进。《山歌》对当时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。《山歌》政治性很强,但不是标语口号式的,由于作者的努力创新,它在新诗的民族化、群众化方面,也取得了

① 张光年:《〈欢呼集〉序》。

② 唐弢、严家炎主编:《中国现代文学史》(三)。

③ 茅盾: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》。

好效果。这期间，袁水拍还出版了抒情诗集《在沸腾的岁月里》。

四十年代后期，有一批中青年诗人在上海诗歌刊物上发表诗作，他们是：辛笛、陈敬容、杜运燮、杭约赫（曹辛之）、郑敏、唐祈、唐湜、袁可嘉、穆旦等。他们忧时愤世，向往光明，采用欧美现代派的写作技巧，写出了一些有现实意义和斗争精神的作品，如辛笛的《布谷》、陈敬容的《力的前奏》、杭约赫的《最后的演出》等诗篇。陈敬容的《力的前奏》，预感到了革命风暴的必然来临。女诗人从自然界的律动，领悟到阶级斗争的风雷。他们之中个别人的诗，比较晦涩，使作品的社会效果受到影响。

当时常在上海或全国报刊发表诗作的，还有苏金伞、沙鸥、青勃、田地、康定、鸥外鸥、韩北屏等；内蒙的纳·赛音朝克图，在香港的黄宁婴，也写了不少诗。这些诗人，各自有个人的风格，像诗的天空中一颗颗闪光的星星。

解放区的诗人们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经过延安文艺整风，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亲身参加群众变革现实的火热斗争，使思想感情和文艺观起了根本的变化，作品面貌为之一新。从李季的《王贵与李香香》、阮章竞的《漳河水》、张志民的《王九诉苦》等等作品里，可以闻到扑鼻的芳香，它们像早晨阳光下闪耀的露珠，像新春园圃里初放的花朵。

李季的叙事长诗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，作于一九四五年年底。在此之前，他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，在三边收集民歌近三千首。《王贵与李香香》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涌现的优秀作品。它真实地反映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与革命斗争胜利的血肉关系，热情地歌颂了王贵和李香香忠于革命的精神以及他们纯朴的爱情。近千行的长诗，全部采用陕北民歌“信天游”的形式，灵活运用比兴手法，写景抒情，塑造人物，节奏明快流畅，增强了诗的形象性和音乐性，使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民族形式达到较好的统一。在诗歌的民族化、群众

化方面,开辟了新的途径。一九四六年九月,诗作一发表,就吸引了读者。陆定一当时就写文认为,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从内容到形式都“出来了新的一套”,“表示了新民主主义文艺运动对于封建的、买办的、反动的文艺运动的胜利”。郭沫若为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作序,称赞它是从“人民翻身”到“文艺翻身”的“响亮的信号”。

阮章竞一九四七年创作长篇叙事诗《圈套》后,又于一九四九年完成了有名的《漳河水》。这是继《王贵与李香香》之后,用民歌形式写成的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叙事诗,是一部妇女解放的颂歌。长诗把争取妇女解放的斗争和社会习俗、思想意识的转变与政治经济变革的关系紧密相连在一起,塑造出三个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。作者把流传在漳河两岸的谣曲加以改造,并吸取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,写出了这部朴实与华美、明丽与清新、刚健与柔婉相统一的优秀作品。

张志民作于一九四七年的《王九诉苦》以及《死不着》等叙事长诗,反映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压迫下的悲惨生活,歌颂他们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得到了翻身解放。《王九诉苦》这首长诗,朴实流畅,不枝不蔓,用粗线条勾勒出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,一发表,就受到热烈的称赞。

当年,活跃在延安、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诗人,还有贺敬之、严辰、李冰、魏巍、邵子南、曼晴、方冰等。其中战斗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青年诗人陈辉是很有才华的,可惜一九四四年在反“扫荡”斗争中壮烈牺牲了,年仅二十四岁。他在革命斗争中成长,用满腔热情去歌唱革命战争。由田间整理出版的《十月的歌》,只是他的一部分遗诗。他的诗刚健朴实,瑰丽浑厚,诗风粗犷、激越、清新、自然,充满战斗气息。其中歌颂晋察冀的《献诗——为伊甸园而歌》及《为祖国而歌》两首,尤为感人。

延安文艺座谈会后,工农兵群众的诗歌创作蓬勃发展,数量丰富,形式多样。农民李有源的《移民歌》(后经文艺工作者加工整理,

成为著名的《东方红》)、战士毕革飞的快板诗《“运输队长”蒋介石》，影响最大。

二

与前两个十年相比，这十二年来的诗歌创作是有着明显的特点的：

1. 时代的主旋律更加突出、响亮。

时代的主旋律，凝聚着这一时代的重大斗争，反映着绝大多数群众的向往与精神面貌，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。这时期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，自然成为诗人们写作的主题，诗歌在斗争中起了冲锋号的作用，以它突出而响亮的主旋律，鲜明而光荣地写在中国新诗史上。这，成为它与“五四”时代、三十年代初期诗歌创作不同的主要标志。“五四”时期的文学，总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，但当时提出的“为人生而艺术”和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创作口号，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作家写作目的的朦胧性和不自觉性。二十年代末、三十年代初的左翼诗人，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，创作红色鼓动诗，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超前性，和我国当时的国情不尽洽和。而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流，在内容上突出了时代的主要矛盾，诗人与时代靠近，与人民贴心，他们反映时代主旋律的诗作，将在中国新诗史上永放光芒。当然，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采的，各个诗人的文艺观和经历不同，因此，围绕时代主旋律的诗歌创作，也是千姿百态的。

2. 对新诗品种、诗体的开拓和探索。

这时期的诗歌不仅主旋律突出，而且品种、诗体多样。抗战初期，街头诗、朗诵诗风行。诗人们响应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“文章下乡、文章入伍”的号召，深入农村、部队，进行抗日救亡宣传。诗人写的标语就是街头诗，如“田地不能挑起逃，要和鬼子干一

遭”。当时，田间是街头诗的积极倡导者，他自己就写了不少风行一时的街头诗。为了让诗歌面向群众，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，朗诵诗应运而生。战前，中国诗歌会曾提倡过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，但较多地限于理论上的探讨。抗战初期，冯乃超在武汉穆木天、锡金创办的《时调》创刊号上发表《宣言》：“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，伸到穷乡，……让我们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。”高兰、光未然都写过质量较高的朗诵诗，他们和徐迟是诗歌朗诵运动的积极推行者。诗歌朗诵运动首先在武汉兴起，继而推及到延安、重庆、桂林等地；抗战后期，在昆明，闻一多、朱自清都积极参加过诗朗诵。朗诵诗和诗歌朗诵运动，在扩大诗歌的影响，推动诗歌大众化方面，起过积极作用，但限于知识分子阶层，未能普及到群众中去。

叙事长诗的丰收，是这时期诗歌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现象，作者除艾青、田间、柯仲平、力扬、臧克家、李季、阮章竞、张志民……外，写小说的老舍，这时也用大鼓调写了叙事长诗《剑北篇》，有一定特色。前两个十年，虽然也产生过长篇叙事诗，但数量不多，高质量的作品少。茅盾认为，诗歌从“抒情到叙事”，“从短到长”，虽然表面上好像只是新诗的领域的开拓，可是在底层的新的文化运动的意义，这简直可说是新诗的再解放和再革命”^①。

政治讽刺诗的勃然兴起，也是这时期新诗品种、诗体的一个开拓与发展。政治讽刺诗，是向往光明的诗人们面对黑暗现实而从内心里迸发出来的火花。“五四”以来，白话讽刺诗的创作是一个薄弱环节。“左联”时期，曾出版过讽刺诗集，但成绩不太显著。这时期的政治讽刺诗，做到了叙事与抒情结合，形象描绘与政论说理结合；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创新。特别是《马凡陀的山歌》，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十二年来，新诗创作在诗体上，既有自由诗，也有格律诗、楼梯

^① 茅盾：《叙事诗的前途》。